

回看 毛泽东

HUIKAN MAOZEDONG

罗平汉 © 著



出版社

013045968

A752
195

罗平汉◎著

HUIKAN MAOZEDONG

回看毛泽东



●
人
民
出
版
社



北航 C1654203

A752
195

责任编辑:王世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看毛泽东/罗平汉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

ISBN 978-7-01-011820-8

I. ①回… II. ①罗… III. ①毛泽东(1893~1976)-人物研究
IV. ①A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7481 号

回看毛泽东

HUIKAN MAOZEDONG

罗平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6

字数:398 千字 印数:00,001-10,000 册

ISBN 978-7-01-011820-8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农村调查 /1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一生事业的特殊组成部分。毛泽东早年就非常注重社会实践,既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正因为他极为注重社会调查,尤其是农村调查,才对中国社会有着透彻的了解,也才能在“众人皆醉”的社会氛围中,号准中国农村之脉,准确把握革命规律。

- 一、《中国佃农生活举例》/2
- 二、组织农讲所学员调查 /5
- 三、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 /8
- 四、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2

“朱毛之争”与古田会议 /16

1929年夏,红四军内部在如何建党建军问题上,曾发生了一场争论,并直接涉及毛泽东与朱德,史称“朱毛之争”。

在中共红四军七大上,争论非但未能解决,反而在选举前委书记时,毛泽东意外落选了。

- 一、红四军军委的“暂时停止”与重设 /16
- 二、“朱毛之争”的起因 /23

- 三、湖雷会议与白砂会议 /27
- 四、毛泽东和朱德“各作一篇文章” /32
- 五、中共红四军七大毛泽东落选 /38
- 六、陈毅的汇报与“中央九月来信” /44
- 七、古田会议成为永恒的历史记忆 /49

革命与利益——毛泽东的《寻乌调查》与《兴国调查》 /55

在革命战争年代，因为革命主要发生在农村，地主阶级也就成为被打倒的对象。当下有人认为，当年的土地改革根本没有必要，理由之一是中国土地集中并不严重；理由之二是纵使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土地的集约经营比分散经营更有利。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从毛泽东的《寻乌调查》中似乎可以得到一些解答。

- 一、大中地主“完全以收租坐视为目的” /55
- 二、小地主对革命的态度因人而异 /58
- 三、农民对革命的态度与利益增损密切相关 /61

1931年赣南会议毛泽东为何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 /65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等人开始向各根据地派出大批干部，一时间“钦差大臣满天飞”。

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是毛泽东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起点。在这次会议上，他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随后又进一步被作为“右倾机会主义”而遭受批判。从1931年11月到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毛泽东在近三年的时间成为王明集团排挤与打击的对象，长期处于“靠边站”的境地。

- 一、中央代表团认为毛泽东“有才干” /66
- 二、赣南会议上毛泽东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 /69
- 三、因反对打赣州毛泽东请假休养 /72
- 四、“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 /76
- 五、长汀会议毛泽东遭“缺席裁判” /79

宁都会议上毛泽东为何失去对红军的指挥权 /83

1932年5月长汀会议后,毛泽东与中共苏区中央局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曾一度重新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但好景不长,双方矛盾再度激化,1932年9月的宁都会议,毛泽东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

宁都会议无疑是一次集中批判毛泽东的会议,对于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中共苏区中央局很不满意,认为他“在斗争上是调和的”。对于这种指责,周恩来表示不能接受。

- 一、周恩来建议毛泽东任总政委 /83
- 二、前后方关于军事行动的分歧 /86
- 三、宁都会议作出决定:毛泽东暂回后方 /92
- 四、毛泽东为何在宁都会议上遭排挤 /96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与中共临时中央的关系 /101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实际上处于无事可做的境地。但他在中央苏区仍有威望,于是中共临时中央刚一到中央苏区,就开展矛头直指毛泽东的反“罗明路线”,甚至提出要将他送到苏联去。

这时的毛泽东完全处于“靠边站”的地位,后来他回忆说:那时候,“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 一、博古反感称毛泽东是“最好的领袖” /101
- 二、“项庄舞剑”式的反“罗明路线” /105
- 三、因查田运动纠偏毛泽东再受打击 /107
- 四、共产国际不同意让毛泽东去莫斯科 /111

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强调独立自主 /114

1937年6月,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何鸣同粤军第一五七师通过谈判,达成合作抗日协定。但是,由于何鸣对国共合作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将红军游击队带往漳浦县城集中改编,以致发生近千名游击队员被国民党军队缴械的“漳浦事件”(即何鸣事件)。

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共面临的这种复杂情况,使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对党内可能出现的右倾危险,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一再强调要保持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

- 一、“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 /114
- 二、对蒋介石“编共而不容共”的警惕 /119
- 三、鉴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教训 /123

1937年十二月会议毛泽东被“孤立”的原因 /126

在1937年的十二月会议上,刚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系统阐述了他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与会多数人的认同,而此前一再强调必须警惕右倾投降危险,保持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独立性的毛泽东却显得“孤立”。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曾对李维汉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由于王明在报告中点了刘少奇的名,所以刘“在会上受到了许多人点名或不点名的批评”。毛泽东后来在谈到这次政治局会议时说:“十二月会议上有人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

- 一、王明在十二月会议发言的主要观点 /127
- 二、王明的主张其实来源于共产国际 /131
- 三、十二月会议毛泽东的“孤立” /133
- 四、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孤立”的原因分析 /136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141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开展武装斗争,举起“苏维埃革命”的旗帜,苏区老百姓很长时间却不知苏维埃为何物。抗战爆发后,中共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之必要”,又发生了共产党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如何区分的问题。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中共的各项主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 /142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论 /147
- 三、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151

四、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63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延安整风 /172

在中央苏区几起几落的人生经历,使毛泽东对教条主义尤为反感。不论是刘安恭,还是宁都会议上“反毛反得最厉害”的任弼时,以及开展反“罗明路线”的博古、张闻天等人,都有在莫斯科学习的经历,在毛泽东看来,他们身上都有教条主义。

在后来的整风中,王明成为教条主义的标本和众矢之的,但在毛泽东准备发动这场运动之时,他眼中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更多的恐怕还是张闻天。

- 一、毛泽东对教条主义深恶痛绝 /173
- 二、毛泽东当时心目中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 /177
- 三、毛泽东认为必须解决什么是理论家的问题 /183
- 四、皖南事变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开展整风 /187

毛泽东怎样发动延安整风 /192

1941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成为整风运动启动的标志性事件。在九月会议上,王明先是指责他人检讨错误不彻底,继而又说要向中央揭穿一个秘密,他说,博古、张闻天当年领导的中央是不合法的。

王明揭露出这个“秘密”,显然是为把博、张二人彻底搞臭搞倒,使博古、张闻天等人不但背上犯了路线错误的责任,而且还存在“篡位”和假传圣旨的问题。然而,王明此举实有落井下石之嫌,结果弄巧成拙,引火烧身,这恐怕是他始料不及的。

- 一、中共中央作出增加党性的决定和毛泽东编“党书” /193
- 二、1941年九月政治局会议成为整风运动启动的标志 /198
- 三、王明利用季米特洛夫电报做文章结果却适得其反 /206

毛泽东对夺取全国政权的科学预计 /214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对时局也曾作出过乐观的估计,开始做参加联合政府的准备,甚至计划将中央机关迁到江苏的淮阴。

全面内战爆发之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多次对中共战胜蒋介石所需的时间作出预计。1948年3月,毛泽东曾说: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爬坡”到顶点;在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

- 一、“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 /214
- 二、“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 /218
- 三、“已经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 /221

毛泽东与农业合作化运动 /227

毛泽东严厉批评邓子恢等人“右倾”,认为他们对合作化运动的领导“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对合作化运动有“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是一种右倾错误的指导方针。随后各地纷纷检查“右倾保守思想”,批判“小脚女人”,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作出重新部署,农业合作社于是迅猛发展起来。

- 一、毛泽东与刘少奇对于山西农业合作社问题的不同看法 /228
- 二、1955年毛泽东与邓子恢关于合作化速度的分歧 /242
- 三、《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再评价 /258

毛泽东与“双百”方针 /270

关于“双百”方针,毛泽东说得很清楚,是“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可是,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却将“百家争鸣”变成了向执政党的工作和执政党的干部提意见,学术“争鸣”变成政治“争鸣”,从而偏离了“百家争鸣”的本意。

在反右派运动的准备阶段,为了“引蛇而洞”,“百家争鸣”作为一种策略还在使用;到了正式反右之后,“百花齐放”就变成了一枝独秀,“百家争鸣”也就变成了一家独鸣。

- 一、“双百”方针的提出 /270
- 二、“双百”方针提出后的新气象 /277
- 三、毛泽东再论“双百”问题 /281
- 四、“双百”方针一度中断的原因 /287

毛泽东为什么批评反冒进 /294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追加 20 亿的基本建设投资,但与会的大多数人不赞成。据胡乔木回忆:“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 一、1956 年经济建设中的冒进 /294
- 二、周恩来主持反冒进 /302
- 三、毛泽东批评反冒进 /311
- 四、毛泽东为什么要批评反冒进 /320

“大跃进”中毛泽东相信亩产过万斤吗? /330

1958 年“大跃进”在农业生产上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各地争先恐后大放各种高产“卫星”,于是有了亩产七八千斤的小麦,几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水稻。其实,当年那些亩产万斤甚至更高的粮食高产“卫星”,如同“皇帝的新衣”,稍有常识的人都不可能信以为真,只不过是谁也不愿把它揭穿而已。那么,出身于农民并对农村十分熟悉的毛泽东,果真相信亩产万斤吗?

- 一、“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 /330
- 二、毛泽东为何相信粮食能大幅度增产 /333
- 三、毛泽东是否相信亩产万斤的高产“卫星” /336
- 四、毛泽东为什么对高产“卫星”持默许和容忍态度 /339

毛泽东是如何发现人民公社问题的 /342

建立人民公社时,各地在分配上搞“吃饭不钱”的供给制,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农民生活集体化,大有共产主义很快到来之势。毛泽东通过调查,发现人民公社存在许多问题。当他了解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很生气,说这种搞法是给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诬蔑帮忙,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他还说: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办?

- 一、“整天只有老头对老头行吗？”/342
- 二、“多劳多得还是社会主义原则”/347
- 三、划清两种所有制的界限 /352

毛泽东与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下放 /363

对于农业“六十条”，毛泽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也希望有了这个东西，农村和人民公社的发展就有了规矩，就不至出大的乱子。但是，是否有了“六十条”，农村和人民公社就不会再出问题，农民的积极性就能提高，毛泽东也是心中没底。他认为有了“大包干”，就能解决大队内部的平均主义问题，不需要再搞“责任田”一类的包产到户了。

- 一、“三包一奖”没有解决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 /364
- 二、毛泽东对下放基本核算单位的思考与农民发明“分配大包干” /368
- 三、毛泽东亲自主持邯郸谈话会肯定“分配大包干” /371
- 四、下放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效果良好 /375
- 五、“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明确规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379

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研究述评 /382

对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的介绍，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而严格意义上的研究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开始的。1993年以来，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毛泽东为何过早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能否“回归”，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成为近来学界讨论较多的话题。

-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研究 /383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大致进程 /389
- 三、近年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 /393
- 四、近年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 /398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农村调查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一生事业的特殊组成部分。毛泽东早年就非常注重社会实践,既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正因为他极为注重社会调查,尤其是农村调查,才对中国社会有着透彻的了解,也才能在“众人皆醉”的社会氛围中,号准中国农村之脉,准确把握革命规律。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一生事业的特殊组成部分。邓小平后来说:“毛泽东同志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①正因为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非常注重调查研究,尤其是极为注重农村调查,他才对中国革命时期的社会情形有着透彻的了解,也才能在“众人皆醉”的社会氛围中,号准中国农村之脉,准确把握革命规律,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115页。

一、《中国佃农生活举例》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期,毛泽东就非常注重社会实践,既重视读“有字之书”,又重视读“无字之书”。他认为,以往思想界“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结果,“凑热闹成了风”,“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①因此,要积极主动地进行社会调查。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②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毛泽东开始了其人生中的初期农村调查实践——“游学”。1917年的七、八月间,他利用暑期与同学萧子升漫游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历时一个月,行程九百余里,沿途接触了城乡各阶层人员,了解当地风土人情,获得了许多新鲜知识。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正如后来人们所评价的:“他日后养成的调查研究作风,从这里已可看出些端倪。”^③

虽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毛泽东就曾用“游学”的方式进行过社会调查,但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的一段时间里,农民问题并没有引起他的高度重视。恽代英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毛泽东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哪里还顾得上农村。后来,他曾多次讲到这个问题。1938年3月21日,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三大队的临别演讲中说:“十五年前,恽代英主张去做平民教育工作,我没有去。”^④所以在建党之初,毛泽东的主要精力也是放在领导工人运动上。他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63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页。

真正意义的农村调查,是从1924年年底开始的。

这年12月,毛泽东离开上海回到家乡韶山养病。在家乡的半年时间里,他一边养病一边利用串门、走亲访友等形式进行社会调查。毛泽东通过同各种人的接触和访问,了解到韶山附近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各种社会情况。其间,他特地到安化县考察这里的社会和革命斗争情况。在进行社会调查的同时,毛泽东还秘密建立了中共韶山支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组织农民协会,成立了20多所农民夜校,并领导家乡农民进行了“阻禁平粜”和争夺教育权等斗争。

毛泽东在组织和领导韶山一带农民运动的过程中,收集了许多关于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材料。他以这些材料为根据,再加上在湘潭西乡同佃农张连初交谈所得情况,写成了《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一文。1927年3月,这篇调查作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之一正式出版。这是目前保存下来的毛泽东用文字写成的最早的一篇调查材料。

毛泽东以一个壮年勤敏的佃农作为分析对象,“假定事实:一个壮年勤敏佃农,租人15亩田(一佃农力能耕种之数),附以相当之园土柴山,并茅屋一所以为住宅。此佃农父母俱亡,仅一妻一子,妻替他煮饭喂猪,子年十二三岁,替他看牛。这个佃农于其租来之15亩田,可以全由自己一人之力耕种,不需加雇人工。因穷,田系贩耕,没有押租银可交,所以田租照本处通例要交十分之七”。^①这个佃农一年的支出是:食粮共72元(大洋,下同)、猪油共3元、盐3.12元、灯油0.84元、茶叶2元、工资36元、种子2.4元、肥料18元、牛力9.824元、农具消耗6.6055元、杂用12元,以上11项共计167.3655元。

这个佃农一年的收入,每亩年获稻谷4石,15亩共获60石,交租42石(十分之七),自得18石,每石价4元,共72元;喂猪每年40元;冬季或砍柴或挑脚可寻钱20元;工食省余(九、十、十一三个月出外砍柴挑脚,不在家里吃饭做事)15.72元;以上4项共计147.72元。收支相抵,亏空19.6455元。而每年147.72元收入,还须假定在下列六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一)绝无水、旱、风、雹、虫、病各种灾害;(二)身体熬炼,绝无妨碍工作之疾病;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页。

(三)精明会计算;(四)所养猪牛不病不死;(五)冬季整晴不雨;(六)终年勤劳,全无休息。

事实上,这六个条件同时具备者很少,尤其是第三和第五个条件。因为“穷苦佃农总是老实者多精明者少,在生存竞争十分剧烈之今日农村,此点关系荣枯极大;而冬天往往风雨连绵,害得穷苦农民大大减少砍柴挑脚之收入”。而且第一条的天然灾害,第二条的疾病,第四条的牲畜病症,都是在所难免。所以,毛泽东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之佃农比牛还苦,因牛每年尚有休息,人则全无。然事实上佃农不能个个这样终年无一天休息地做苦工,稍一躲懒,亏折跟来了。这就是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而许多佃农被挤离开土地变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①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编印的《革命》第4期上,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其中分析了“半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这里的“半无产阶级”,主要指的就是农民。毛泽东此时将“半无产阶级”划分为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五种,认为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他还具体分析了半自耕农和贫农的三种不同的经济状况及其不同的革命性。

次年1月1日,毛泽东又在《中国农民》第1期上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文章将农村分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游民等阶级和阶层。认为大地主是中国农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军阀的真实基础,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唯一堡垒;小地主对于现代的革命采取矛盾态度;自耕农的情况比较复杂,但革命高潮到来时,各种自耕农是全部可以倾向革命的;至于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都是要求革命的,但因其经济地位有差异,故革命性也有所不同;而雇农在农村中是“甚感痛苦者,做农民运动极要注意”;游民无产阶级“很能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对农村的不同阶级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如此详细的分析,在当时党内是不多见的,而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页。

“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无疑为他的这些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据”^①。

二、组织农讲所学员调查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人的提议,通过农民运动的决议案,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林祖涵(林伯渠)、萧楚女等九人为委员。3月16日,农民运动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1924年7月创办的,由彭湃担任主任(第二届至四届由共产党员阮啸仙担任主任,第五届仍由彭湃任主任)。农讲所每届时间为1个月,学员毕业后选派为农民运动特派员。第六届学员来自全国20个省,共300多人,是历届农讲所规模最大的一次。这些学员大部分是工人、农民、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他们把各自所熟悉的当地农村情况带进农讲所。“毛泽东认为这是了解农村的极好机会,他就把这些学员作为调查对象,向他们了解各地农村各方面的情况。毛泽东经常向学员印发一些调查表格,要求学员们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填写出来。”^②

当年参加第六届农讲所学习的湖南籍学员王首道,在1961年撰写的《革命的摇篮——回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文中说:“在农讲所的整个学习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教育和引导我们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在这期间,他除了引导学员坚持社会调查外,还以学员为对象,作了许多关于农民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在教学中充分运用这些材料,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③河北籍学员张明远也回忆说:“毛泽东还在学员中成立农民问题研究会,充分利用学员来自全国这一有利条件,亲自主持召集来自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页。

② 孙克信等编著:《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

③ 王首道:《怀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4页。

省的学员开调查会。不能参加调查会的,都发给调查提纲。从阶级关系、宗教信仰,到风俗习惯、秘密社团,以及歌谣谚语等等,都在调查之列。”^①

由于第六届农讲所的学员来自各省,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教务主任陆沉(当时是共产党员)的指导下,农讲所根据学员所在地区,分别组成了两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江浙、安徽、四川、云贵、奉直、山东、豫陕、三个特区(热河、察哈尔、绥远)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每个研究会推选干事1人,书记1至8人,由其主持会务。研究会每星期开会一二次,引导学员研究实际问题,要求学员就如下问题开展调查:

(一)租率;(二)主佃的关系;(三)抗租减租平粜等风潮;(四)利率;(五)拖欠逼账及烂账等情形;(六)田赋;(七)抗粮情形;(八)厘金杂税杂捐及临时捐;(九)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数目比较;(十)地主的来源;(十一)货物价格与农产品价格之比较;(十二)工价;(十三)失业情形;(十四)祠堂组织及族政情形;(十五)地方公会组织及财产状况;(十六)地方政治组织;(十七)地方政治情形;(十八)会党及土匪;(十九)团防情形;(二十)教育状况;(二十一)销售何种洋货影响如何;(二十二)兵祸及其影响;(二十三)天灾及其影响;(二十四)贪官污吏及其影响;(二十五)烟赌偷抢各种情形;(二十六)出产什么及其销售地;(二十七)妇女的地位;(二十八)农民的观念及感想;(二十九)从前与现在地价之比较;(三十)从前与现在农产品价格之比较;(三十一)农村组织状况;(三十二)地质之肥沃;(三十三)宗教之信仰状况;(三十四)度量衡;(三十五)民歌;(三十六)成语。

第六届农讲所学员通过搜集农村各方面的材料,集体讨论分析,加深了对农村中各阶级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认识,学到了如何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提高了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为了使学员掌握实际的调查研究方法,毛泽东还组织学员分别到当时农民运动开展得较好的海丰、韶关等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了解农村各阶级状况,了解农会组织及对敌斗争的方法,学习农会的工作经验,增强了学员们从事农民运动的决心”。^②

第六届农讲所的学员撰写了一批调查报告,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亲自

^① 张明远:《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② 孙克信等编著:《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0页。